

# 越轨社会学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

刘 能

**内容提要：**青少年越轨与犯罪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较完整地介绍了越轨社会学领域中有关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的种种理论取向，结合对中国社会现实情境中可能影响我国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现象的重要的社会趋势的分析，对各种越轨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进行了简要评估。进而建构出了一个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研究青少年越轨和犯罪问题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给出了如何控制我国青少年越轨和犯罪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社会变迁时期，除了经济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外，我们也看到了社会领域中其他相伴随的重要社会趋势。社会安全领域中各种主客观指标的恶化——体现为犯罪率的上升、居民安全感的下降、原先已经绝迹的犯罪现象（如吸毒、卖淫等）的重新泛滥、新型犯罪类型（如白领犯罪和网络犯罪）的出现，以及犯罪对象的低年龄化和团伙化等——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社会趋势（郭星华，1999；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1989；乐国安，1994；王智民、郭证，1992；何秉松，2002；林喆、马长生、蔡雪冰，2002）。这其中，犯罪对象的低龄化<sup>①</sup>和团伙化，恰好和我们本文所要讨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由于青少年犯罪涉及到特殊的对象人群，因此学术界对青少年犯罪现象一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国内研究，或者仅仅从一个侧面（如个人特征和心理原因）出发，单纯探讨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或者只是涉及某一社会制度（如家庭）和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或者只是强调青少年犯罪治理的政策层面，而往往没有对解释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整个理论体系以及青少年犯罪发生的具体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做整合性的介绍和阐明。本文从越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希望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叙述和讨论，能为理解我国社会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提供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较具体的经验背景。

## 一、越轨社会学中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种种理论取向

在对越轨社会学中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种种理论取向进行简要介绍之前，我们先做三点申明。第一，除了社会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科——如体型学、颅相学、遗传和基因分析、生物化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也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由于种种原因<sup>②</sup>，这些学科对越轨和犯罪现象的解释，效度并不很高。由于篇幅所限，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对真正社会学取向的理论进行介绍。其次，社会学取向的越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社会互动过程和社会控制机制之类的社会变量对人们是否卷入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个人特征的解释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特征对于青少年的越轨

和犯罪倾向没有任何影响。第三，本文介绍的各种越轨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城市社会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借鉴它们来分析我国的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现象时，可能对我国城市社会的解释力较强，而对我国农村地区的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现象来说，则还必须加入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等诸多因素，才能更好地加以解释。

### 1. 社会解组论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社会解组论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在对芝加哥这个城市进行实地研究时提出来的。研究者们发现，某些越轨现象的发生率特别集中于芝加哥市的某些区域，尤其是城市中心的工商业区，因此，他们假设，这些区域的越轨高发率，原因在于那里存在的社会解组现象。从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解组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移民、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迁，导致都市居住区的社会规范的崩溃和社会控制的削弱而引起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们发现，最有可能处于社会解组的城市地带的特征是：人口流动性大、人口的种族和族群成分复杂、移民的比例较大、居住区的社会组织程度和社会控制力度比较松弛，相应地，这些区域发生越轨事件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因此，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的社会和物理特征，决定了他实施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这一学派又被叫做社会生态学。

#### Shaw and McKay 对芝加哥地区青少年越轨发生率的研究

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中，有很多都对各种越轨和犯罪现象进行了研究（如 Cavan, 1923; Thrasher, 1927; Faris and Dunham, 1939），但是专门对青少年越轨现象进行研究的，当推 Shaw and McKay (1942)。他们以都市同心圈模型 (Park and Burgess, 1925) 为基础，对 1900 到 1933 年间芝加哥市的 56000 份青少年法庭报告进行了数据整理，并以越轨者的居住地为计算基准，对该市的青少年越轨发生率做了生态学的分布处理。他们发现，尽管芝加哥城市中心区域居民的族群成分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更替（先是英裔、德裔和爱尔兰裔，然后是波兰裔，后来是南部来的黑人），但是这个区域的青少年越轨率一直是全市最高的。由此，Shaw and McKay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城市中心区域的结构条件（如破败的住房、贫困和高离婚率等），而非各个族群居民的个人特征，才能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还假定，那些越轨的青少年，如果能够居住在较完善和发达的社区的话，那么将会大大降低他们的越轨发生率。下面，我们以图表的形式，给出了 Shaw and McKay 的理论解释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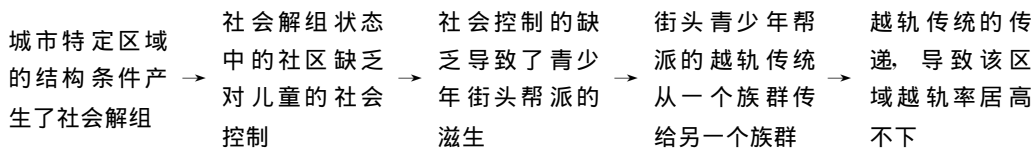


图1 Shaw and McKay 关于青少年越轨的社会解组论的解释逻辑

### 2. 失范和张力论 (Anomie and Strain Theory)

越轨社会学中的失范理论，最初是由 Durkheim 提出来的，用于解释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中的不同自杀率；规范指明了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也引导了人们的预期和欲望；一旦规范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受到扰乱，就会导致人们的欲望不受限制，从而遭遇到更多的挫折，自杀率也就随之飙升 (Durkheim, 1897)。默顿 (Merton) 则通过把“规范”

分解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和“满足这个目标的合法手段”这样两个部分，揭示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并认为这一张力最终将使某些人群走向越轨和犯罪。具体来说，美国社会的文化目标是成功，尤其是表现为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成功（美国梦）。但是达成这一文化目标的合法手段却是有限的（如通过良好的教育，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穷人和少数民族总体而言，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因此，他们将处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结构张力之中，并倾向于采用非正统的方式，包括越轨和犯罪（如成为职业罪犯、参加犯罪团伙和贩毒等）来实现这一目标（Merton, 1938）。

Cloward and Ohlin 对青少年帮派形成机制的研究

Cloward and Ohlin 通过提出“非法机遇结构”这个概念，对默顿的张力理论进行了扩展（Cloward and Ohlin, 1960）。首先，他们同意默顿做出的如下判断：即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都被鼓励去追求物质成功这一文化目标，而且与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他们也更有可能发现这个目标不容易实现，更有可能受挫，因为往往只有十分有限的合法途径向他们开放。因此，他们往往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的驱使下，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做出越轨的行为来，尤其是默顿所说的创新型越轨。但是，Cloward and Ohlin 认为，默顿的理论隐含地假定，在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无法获得通向成功的合法机会时，他们获得非法机遇而卷入越轨和犯罪行为的机会则是均等的。Cloward 和 Ohlin 则认为，即使是非法的机遇，对于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也是不均等的。他们分辨出了以下三种类型的青少年帮派，揭示了由非法机遇结构的供给所决定的不同形成机制（参见表 1）。

表 1 Cloward and Ohlin 关于三类青少年帮派的形成机制的说明

职业犯罪帮派	暴力帮派	吸毒—退缩者的帮派
如果这些青少年所居住的社区有职业犯罪团伙生活和运作，并且是社区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果你既有天分、胆又大，能够被这些团伙招募，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团伙成员，能够获得你所追求的金钱和物质享受。	如果社区里没有职业犯罪团伙的存在，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但如果你天生好勇斗狠的话，那么你也可以通过组成暴力团伙而获得自己的地位。	如果两样条件都不符合，那么你只好进入一个吸毒的亚文化里面，获得兴奋的感觉，并逃离自己所感受到的结构张力。

3. 阶级—亚文化理论 (Class-based Subculture Theories)

阶级—亚文化理论的出发点，首先也是起源于和默顿的张力理论的对话。在默顿的理论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青少年，由于他们所体验到的文化目标和合法手段之间存在的张力，最终将驱使他们选择越轨和犯罪作为达成文化目标的替代手段。但是，事实上，不仅对于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青少年来说，存在着目标和手段间的张力，即使在中产阶级的青少年那里，这一张力也同样存在。那么为什么主要是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青少年选择了越轨和犯罪这样的替代手段呢？因此，除了感受到的张力之外，还需要加入其他因素才能加以解释。以阶级为基础的亚文化理论，提供了这样的解释要素：即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青少年所具有的亚文化特征，解释了他们在面临张力和挫折时，选择越轨和犯罪行为作为替代手段的倾向。

Cohen 关于地位挫折感和下层阶级青少年越轨亚文化的研究

Cohen 的观点来自于对学校中的青少年的研究（Cohen, 1955）。他指出，美国社会不区别地以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因此，来自下层社会的孩子们在学校里

遇到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学业成功、理性、控制暴力和侵略行为、延迟欲望的满足、尊重财产权、礼貌待人等。与此相对应，下层阶级的文化则鼓励非理性、即时的冲动和反应、暴力和侵略性的展示、不尊重财产等。那么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如何在学校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即他们所学会的东西正好是这个社会环境所不齿的）实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呢？还是说，他们争取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呢？Cohen 发现，解决这个地位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颠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而崇尚自己的文化要素（如暴力和侵犯、破坏财产、即时享乐、学业失败）等。因此，参加青少年帮派成了下层阶级男孩们解决地位挫折感的一个主要办法。图 2 展示了 Cohen 的解释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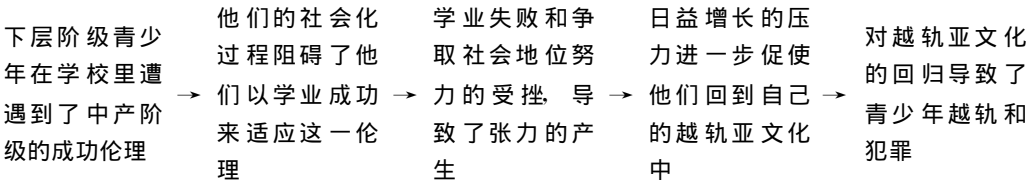


图 2 Cohen 的地位挫折感和下层阶级越轨亚文化理论的解释逻辑

Miller 的下层阶级文化论和青少年越轨

Miller (1958) 提出了自己的下层阶级文化论，用以解释青少年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尤其是青少年团伙犯罪现象。Miller 的核心观点是：他认为在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亚文化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文化关注焦点 (focal concerns)，分别是“制造麻烦、强硬、机灵、追求刺激、相信宿命和保持自主性”等，每一个文化关注焦点都迫使下层阶级的年轻男性直接和法律及执法机关相冲突。比如说，对强硬的强调，通常导致人们通过打架、袭击或和警察对峙等方法来展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又如追求刺激，使得人们寄意于赌博、斗殴和狂饮。Miller 认为，只要年轻人被卷入到下层阶级的亚文化之中，就一定会违反法律，因为他们对自己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文化标准保持着忠诚感。参见图 3 对 Miller 的解释逻辑的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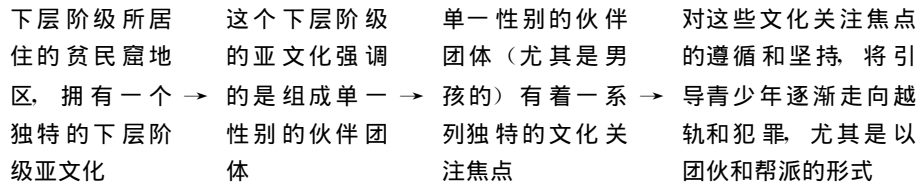


图 3 Miller 的下层阶级文化论的解释逻辑

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论和青少年越轨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产阶级青少年的越轨和犯罪率有激增的趋势，因此一批研究者开始对这一现象加以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发现，便是中产阶级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率的上升，在于中产阶级的青少年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起源于对中产阶级青少年的社会身份的重新建构和阐释（如青少年应该服从权威、青少年应该努力学习、青少年应该在两性关系上保持纯洁、青少年应该参与公民行动但却没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这一切不但

使青少年面临了许多困惑，而且还把他们和成年人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一隔离，导致了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以享乐主义和不负责任为其主要构成要素——的形成，并最终导致他们卷入到越轨和犯罪行为当中（England, 1960; Scott and Vaz, 1967）。图 4 给出了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论的解释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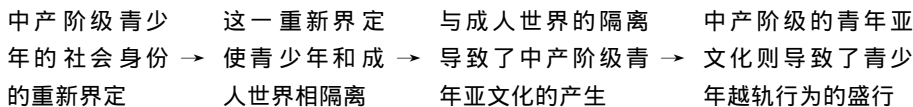


图 4 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论的解释逻辑

#### 4. 学习理论 (Learning Theories)

越轨社会学中的学习理论的总的观点是，越轨是人们习得越轨规范和价值观的结果，因此，它特别关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在所有学习理论当中，最出名的就是萨瑟兰 (Sutherland) 的随异交往论 (Differentiate Association Theory)。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1) 犯罪行为，以及广义的越轨行为，都是习得的。(2) 犯罪行为，或者说广义的越轨行为，是通过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而习得的。与越轨和犯罪相关的技巧、情感、价值观、态度和动机，以及合理化机制等等，都是通过人际交流而传递下来的 (Sutherland and Cressey, 1939)。虽然 Sutherland 的理论并没有直接对青少年越轨进行阐述，但是他的以下三个命题，却暗含了对青少年越轨的解释：

\* 时间先后性 (priority) 命题：一个人接触越轨导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时间越早，他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越深，未来就越有可能越轨。

\* 互动频率 (frequency) 和强度 (intensity) 命题：一个人与认可越轨价值观和态度的朋友或熟人的关系越紧密，他们间的互动越频繁，互动的质量越高，那么这个人未来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

\* 互动延续时间 (duration) 命题：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和越轨者接触，就会逐渐学会越轨，即不但学会越轨的技术，而且还学会消除犯罪感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合理化机制。

Bandura 的角色示范和模仿理论：电视暴力和青少年越轨

学习理论的各个分支当中，直接关注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当数 Bandura 的角色示范和模仿理论 (Bandura, 1973)。这一理论继承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对儿童的侵犯行为的习得过程，进行了专门的实验观察。Bandura 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期在成人越轨角色的示范之下，即便只是通过大众媒体 (如电视) 中的暴力行为的演示，都将导致青少年和孩童学会这样的越轨行为，并进行模仿。

#### 5. 控制理论 (Control Theory)

在越轨社会学的所有理论取向中，只有控制理论是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且，与前面的理论取向相比，控制理论的关注点也正好相反：前面的理论关心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什么会越轨？而控制理论则反过来问，人们为什么不越轨？总的来说，控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因此背离规范是十分正常的，但人们为什么不越轨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

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因此，并不是由于人们和越轨亚文化的纽带才吸引他们越轨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越轨的。下面，我们就以 Hirschi 的社会控制理论为例，阐明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越轨的解释逻辑。

### Hirschi 的社会控制理论和青少年越轨

Hirschi (1969) 的社会控制理论主要依托于以下四个概念：联系 (attachment)、承诺 (commitment)、投入 (involvement) 和信仰 (belief)。简单来说，如果青少年和父母、教师、牧师或雇主的联系越多，他们对家庭、学校、宗教和职业组织等各种制度的承诺越多，或者他们投入到学校的、家庭的、宗教的和职业的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他们对各种社会制度的信仰越深，那么他们违反社会规范卷入越轨和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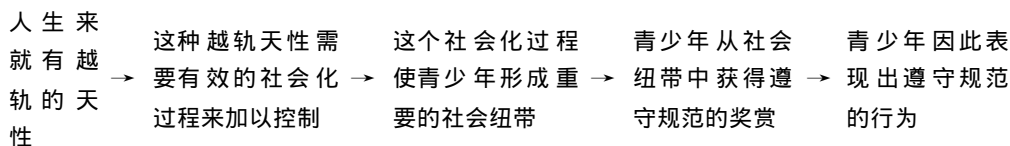


图 5 Hirsch 的社会控制理论的解释逻辑

## 6. 标签理论 (Labeling Theory)

建立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之上的标签理论，为越轨社会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首先，标签理论引入了一个激进的相对主义的越轨观，即行为本身并无所谓越轨还是不越轨，而只是在某个社会中，由于人们把它们认定为越轨行为并依此做出反应，它们才成为越轨的行为。其次，标签理论阐明了越轨标签的自我预言证实过程，即来自官方或社会观众的越轨标定以及标定所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的社会后果，使得人们只能以被标定的越轨身份做出回应，从而反过来证明了自己的越轨身份。第三，标签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如何经由这样一个自我预言证实的进程，而从初级越轨者转变为次级越轨者的：越轨标签让被系者相信自己可能是坏的、邪恶的，而这一自我认同感的确认，阻碍了他们重回正道的合法机会，从而使得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接纳越轨者的角色，或者在越轨者的亚文化里寻求社会支持，并更深地介入到越轨者群体的活动中去 (Becker, 1963; Kitsuse, 1964)。下面，我们通过引入 Chambliss 的一个著名研究，来说明标签理论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解释。

### Chambliss 对两群青少年的越轨生涯的研究

Chambliss 对两群青少年的越轨生涯的研究，揭示了“选择性标定过程” (selective labeling) 最终是如何制造出青少年的越轨身份来的 (1973)。他在某个小镇选择了两个来自不同阶级的青少年团伙——由 8 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男中学生组成的“圣人团伙”和 6 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男中学生组成的“无厘头团伙”——来进行研究。“圣人团伙”犯下了许多严重的越轨行为，如经常酗酒、逃课、非法驾驶，还经常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他们最严重的越轨行为是，在晚上移走建筑工地前设置的安全警示路障，然后躲在一边看路过的汽车翻转或掉入大坑。但是，由于他们出生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小镇上的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好孩子，警察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越轨行为而逮捕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越轨行为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而已。当“圣人团伙”的青少年进入成年时，他们都上了大学，成了医

生、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与此相反，“无厘头团伙”的命运却与之截然相反。他们也经常卷入到越轨行为当中，尤其是打架斗殴。但是与“圣人团伙”相比，他们的越轨行为，一般很少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如汽车的损毁），因此实际的危害要小于“圣人团伙”。但是，由于他们出生于穷人家庭，因此镇上的人都把他们看成是“麻烦制造者”，而且警察也常常把他们列为可能的嫌疑犯。当他们进入成年时，他们不但只能找到低收入的工作，而且最后都进了监狱。图 6 展示了 Chambliss 的研究背后所隐含的解释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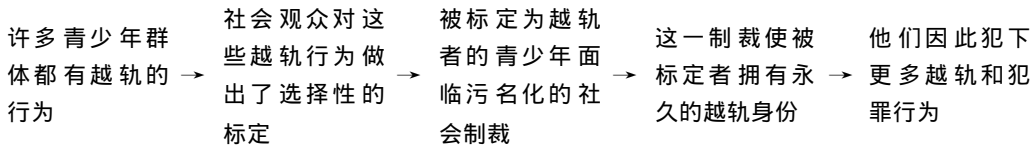


图 6 Chambliss 的研究所隐含的解释逻辑

### 7. 女权主义理论 (Feminist Perspectives)

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在于先前的越轨理论，几乎都是以男性的越轨现象为关注对象的。随着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197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越轨理论为越轨社会学的理论宝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女权主义理论主要关心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女性的犯罪率明显地低于男性？（2）为什么女性往往成为各种犯罪行为（尤其是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3）为什么当代女性的犯罪率会逐渐升高？（4）不同亚类（如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的犯罪率为什么会有差异？（5）司法体系在面对女性越轨和犯罪时的法律反应和所使用的法律手段，是不是与处理男性越轨和犯罪时的那一套有所不同？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女权主义越轨理论的 5 个理论视角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 自由派女权主义把妇女的不平等地位追溯到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进程和由此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和妇女所遭受的歧视。因此，男性和女性在犯罪率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由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所造成的。而 1960—1970 年代女性犯罪率的升高，则是由于：（1）妇女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模式发生了变迁；（2）她们在工作场所有了更多的机会（Adler, 1975；Simon, 1975）。

\*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视角，则把妇女的受压迫地位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因为工业资本主义导致了“父权制”（即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因此，男性和女性在犯罪率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由于男女两性不同的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导致的活动空间和经济责任感的差异而造成的。而 1960—1970 年代女性犯罪率的升高，则是由于那时候大量妇女外出工作，承担了经济独立的责任，但她们的工资却很低，因此她们常常处于贫困的状态，而贫困又导致了她们为了维持生存而犯罪（Szymanski, 1976）。

\* 激进女权主义视角则认为父权制先于资本主义而产生，因此，妇女的受压迫地位来自于性别统治而非阶级统治。所以，诸如强奸、殴打妇女、乱伦、淫秽和色情物品，以及以女性为对象的暴力犯罪，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副产品，而是所有社会的男性为了维护并扩展他们对女性的统治地位而使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Dworkin, 1981）。

\* 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视角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统合到了一起，因为它把“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也即“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作导致女

性受压迫地位的两大来源。性别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但解释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犯罪率，也分别解释了阶级和性别在诱发某些种类的越轨和犯罪行为，以及引起特定的司法反应上所起的混合作用。比如说，上层阶级男子所犯下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将十分不同于下层阶级妇女所犯下的越轨和犯罪行为。而绝大多数犯罪女性都是穷人，而且她们在整个司法体系中，还要受到父权制原型观念的迫害（Eisenstein, 1979）。

\*“有色人种妇女”的女权主义视角（“Women of Color” Feminist perspective）则强调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三重压迫在当今社会中所具的重要意义。该理论认为，虽然女性总体上的犯罪率低于男性，但是黑人女性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白人女性的犯罪率，而且黑人女性的受害率，也要高于白人女性。因此，了解“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一三重统治的真实性，对于我们理解越轨的形成、受害经历的体验，以及司法体系的真实运作过程，是十分关键的（Simpson, 1989）。

### 女权主义越轨理论和青少年犯罪

女权主义越轨理论的诞生，为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引入了性别这个重要的变量。就青少年犯罪问题来说，女权主义越轨理论主要关注两个与性别角色社会化相关的重要话题：（1）女孩的成长经历和她们日后越轨行为的关系；（2）男孩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和女性受害经历的关系。

在女性的成长经历中，性别角色社会化往往鼓励她们发展出“女性化的气质”，即与男孩相比，她们应该更具依赖性，更少竞争性，更为关心他人。父母对女儿行为的监控，也要比对儿子行为的监控严格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孩一般比男孩更少越轨（Chesney—Lind and Sheldon, 1992）。但是，另一批研究者则发现，在女孩的成长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性虐待——可以解释她们后来的越轨行为，因为女孩往往以离家出走、吸毒和卖淫来回应自己所受到的性虐待（Arnold, 1995）。这样，把“女性界定为性对象”这样一种父权制的价值观，通过性虐待这样一种实践形式，最终把许多女孩子推向了越轨和犯罪。

同样，在男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强调的则是“男子汉气概”的塑造。但正是男权的统治地位和对“男子汉气概”的强调，才导致了男孩子介入到一系列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当中（Polk, 1994），尤其是以女性为对象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如强奸、家庭暴力和其他的性侵犯行为（Stanko, 1985）。由此可见，男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解释了男孩子相对于女孩子而言较高的越轨和犯罪率，以及女孩子较高概率的受害经历和体验。（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邮编：100871）